

史漢選讀



中國文學名著叢選

史漢選讀

王 鄰 蘇 選 註

春明出版社出版

內 容 提 要

西漢歷史散文中，「史記」與「漢書」都是傑出的作品。它們的價值不但在史學上獨樹一幟，在文學上也表現了高度的藝術手腕。它們把活潑而豐富的語言，重要人物的個性與動作，生動地加以刻劃與描繪，因而留給後人以不能磨滅的印象。因為「漢書」是直接學習「史記」的，所以將這兩書中最精彩的部分，選錄在本書中，對於愛讀我國古代的傳記文學者，當有參考的價值。

史 漢 選 讀

選 註 者：	王 鄺 蘇
出 版 者：	春 明 出 版 社 上海山西南路10弄3號
印 刷 者：	京 華 第 一 印 書 館 上海寶安路61號
經 售 者：	上 海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書號：506

開本：762×1067 1/29

字數：135千字

頁數：118

印張：8 2/29

定價：1.05元

出版年月：1956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6,000冊

導言

史記與漢書，一是記傳體正史中「通古爲書」的創始，一是記傳體正史中「斷代爲書」的典型，同爲我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古典著作。它對我國漢代及漢代以前的政治軍事和社會經濟發展，均有相當詳盡的記載，因此是研究我國古代歷史的必備書籍。同時，這兩部書所涉及的史事，波瀾壯闊，對於歷史人物的雕塑非常生動，文字遒勁，筆觸鮮明，在傳記文學上尤有巨大的價值。從前我國的史學界都稱這兩部書爲「正史」。我國的歷史記錄，內容的豐富，記述的詳盡，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這與史記、漢書爲首的正史體例的開創，自然有密切的關係。

史記、漢書以及後漢書、三國志，過去曾稱之爲「四史」，由於這些著作大都成於私人之手，多少避去統治階級的干涉，所以含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這在史記中尤其可以看出來。這些書問世後，在我國古代人民中樹立了極大的威信，宋代史學家鄒樞甚至說：「『六經』之後，惟有此作。」但是自從晉後公家設局「監修」正史後，後出的一些正史就變成了爲封建社會制度和本朝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在裏面有的史實被歪曲了，有的被故意遺漏了。這些著作雖然在形式體例上與史記等書相類，但它們無論在歷史記載的正確性上，或在寫作的水準上，却都大大降低了。

四史中，最有價值的是史記，其次是漢書。本書所選的，也以這二書爲限。現在分別將史記與漢

書的具體內容及其作者生平作一簡短的介紹。

史記作者司馬遷，字子長，生於公元前一百四十五年（一說公元前一百三十五年），即漢景帝在位的晚年。卒的年代約在公元前八十六年。他所處的時代，大致就是漢武帝在位的時代。當時漢朝是亞洲唯一的大國，正是長期休養生息，下走向封建社會的上昇階段，國力富強，經濟和文化均極發達，在這種物質生活比較富裕的情況下，自然產生出許多優秀的作家來。在漢武帝時，先後出現許多著名的作家學者，如東方朔、枚乘、孔安國、董仲舒、司馬相如、司馬遷等，而反映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最突出、最全面的，要推司馬遷。

司馬遷的家庭，世代相傳是歷史學家和天文學家。他的父親司馬談，做過漢朝的太史公達三十年之久，還精通易經和道家學說，曾有一篇優秀的批評文字論六家要旨流傳於世，說明了司馬父子學術思想的淵源。此外，司馬談還寫了許多有關歷史的著作，史記中一部分著作可能就是他寫的，還有一部分則是司馬談搜集資料或者寫好了草稿，由他的兒子司馬遷加以整理、改編而成。司馬談死於公元前一一〇年，他的事業便由司馬遷繼任。

司馬遷十歲以前住在鄉下，生活在農人和牧童之間，這就使他有了接近勞動人民的機會。十歲時，他到了長安，跟當時的名儒孔安國學古文尚書，受了很深刻的儒家教育。二十歲時，他開始壯遊天下，先到江淮一帶，然後又到會稽，經過長沙，以後又北上齊魯，南轉徐州，西經大梁（開封），再回到長安。一路上訪問名勝古蹟到處找野史田夫談話，研究了當地的歷史傳說。例如在魯時他就參

觀孔廟，在徐州時就憑吊楚漢相爭的古戰場。二十四歲以後，他又追隨漢武帝到過西北各地，參與了幾次規模偉大的巡行，又曾出使巴蜀，直到昆明。這些實地考察，增加了他寫作歷史時的具體內容，使他的敘述非常生動而具有高度的現實性。

司馬遷正式寫史記是在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立志要在這部書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因此將他的精力大部分化在這本書的寫作上。但同時因為他還是優秀的天文學家，所以還參與了當時的曆法——「太初曆」的修訂，這曆法就是我們現在所用的農曆，其對我國人民的貢獻，並不亞於史記。

當司馬遷正在寫史記的時候，他的朋友李陵領了少數軍隊與匈奴作戰，結果因戰敗而被迫投降匈奴。漢武帝要治李陵的罪，司馬遷一向器重李陵，這時却挺身而出，說了幾句公道話，觸犯了漢武帝，竟因此遭受腐刑。司馬遷認為這是最大的侮辱，憤不欲生，但爲了要完成這部不朽鉅著，他就忍受了侮辱，繼續從事他的寫作，這樣大概過了八九年，當史記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時候，他便死了。

司馬遷的史記，凡一百三十篇，內分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等五種紀述方式，其中以列傳和書最爲重要。

史記之所以偉大，由於它是一部富有人民性的著作。這可以從許多地方體會出來。在卷八十八蒙恬列傳中，他寫道：

「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築長城亭障，堦山谿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

侯，天下之心未定，癘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殫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

司馬遷認爲虐民傷財，「輕百姓力」，就是該殺的人。蒙恬築長城，固然在國防上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主要還是爲了宣揚統治者的武功而使百姓受到沉重的災難，因此在司馬遷看來，他的「兄弟遇誅」，是「不亦宜乎」的。

蒙恬是將軍，但司馬遷認爲不論你是宰相也好，將軍也好，都應該以保護人民爲唯一職責。因此他說蒙恬不利用他「名將」的威望「殫諫」，阻止秦統治者的虐待百姓，就是蒙恬的錯誤。他認爲只有對人民作出貢獻的人，才是好的，忠於統治者而不顧人民利益，這就叫做「阿意」，是應該加以否定的。這些卓越的見解，不是深切地表現了司馬遷熱愛人民的精神麼？

正是因爲司馬遷熱愛人民，所以他對歷史人物的看法，也與別的歷史學家不同。爲統治階級服務的歷史學家們在選擇歷史人物時，總是選擇些王、侯、將、相，換句話說，他們從人的社會地位的高低，來衡量人物的偉大與否，至於平民，他們是不放在眼中的。這種權威思想，是歷代封建剝削階級統治人民的思想基礎。但是司馬遷却將大批平民寫到他的著作中，而且對他們大事讚揚。史記中的游俠列傳、魯仲連列傳、司馬季主列傳、滑稽列傳、仲尼弟子列傳等就是這樣的著作。在游俠列傳中他對普通人民的道德品質極力表揚說：「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潭滅

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忤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他尤其推崇那些看不起公卿權貴的平民，他爲魯仲連竟立了傳，而且寫道：「全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諂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另一方面，他對統治階級及其爪牙，則竭力抨擊，爲統治階級推崇的英雄漢武帝，被他寫得多麼可笑而渺小啊！自然漢武帝在北却匈奴鞏固國防，以及基本上完成國家疆域的統一是有功績的；但他的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封禪求仙，是應該批判的。他對官僚們如張湯、公孫弘、袁盎、田蚡的社會面貌，揭露得何等尖銳而詳明！當人們正在崇拜官僚，努力鑽營，想升官發財的時候，他却表現了對那些剝削人民的官僚的輕蔑態度：「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贖！」在司馬遷看來，地位極高的官僚只不過是「碌碌」之流，而普通人民，「布衣之徒」，則多是優秀的人物。二千年前的歷史學家，竟有這樣大膽的思想，而且敢於這樣筆之於書，真是難能可貴的思想家了！

因爲司馬遷如此了解人民、熱愛人民，所以他在寫作的方法上也與一般的史學家不同。在他看來，官書和檔案並不是完全可信的，統治者爲了掩飾自己的行爲，有時就可能歪曲歷史。因而他除了利用官書和檔案外，還作實地考察，並直接訪問老百姓。例如蕭何、樊噲、曹參等微時的歷史，就是他從豐沛的老百姓那裏探訪來的。這種實際調查研究、依靠羣衆的精神，使他的著作內容豐富多彩，成爲我國最優秀的歷史著作之一。

司馬遷深刻的同情人民並且熟悉古代的歷史，因此他對歷史的體會，也和一般的封建社會的歷史

學家有很大不同。他已經有些感覺到，歷史發展有其必然的趨勢，客觀的規律，不是兩三個統治者所能決定的。因此他往往不自覺地從經濟因素及政治因素來考察歷史。例如，他一方面痛恨虐待人民的酷吏，另一方面，却又找出了酷吏產生的客觀原因在：「干戈日滋，行者賡，居者遂，中外騷擾而相率，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平津書）

這就是說：捐稅越重，對人民榨取越厲害，人民的消極反抗和積極反抗也越厲害，於是統治者也必須用更嚴酷的法令來對付人民，用善於搜括民財的人來掠奪人民，因而酷吏也就必然產生。從知酷吏的產生不只是少數酷吏的人格問題，而是統治者剝削人民達到嚴重時的必然產物。這不是善於從社會經濟觀點來考察歷史麼？

因為司馬遷對待歷史事件具有一定的唯物態度，所以他看一個朝代的得失也與當時的一般人有些不同，當時的人將秦一筆抹煞，完全否定秦在歷史上所起的積極作用，而司馬遷則能從歷史的觀點去辨別秦，認識到秦對當時中國的社會發展，是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的。他說：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見而俗變相類，識卑而易行也。學者率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六國表）。

「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損減，大抵皆襲秦故。」（禮書）

這些論調，都是比較接近史實的。要之，司馬遷是不從道德看問題，而是從事物在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來看問題的。這確是很不容易的事。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由於司馬遷對歷史的深刻研究，使他感覺到：事物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事物是不斷在發展，在變化的，因此在考察歷史事實時，就要從運動中、發展中去考察，這種樸素的辯證思想，是我國哲學史上的優秀傳統，而司馬遷恰恰是這種傳統在歷史科學上的具體應用者。再看他說的話吧：

「閭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自序）

「儒者斷其義，馳說者聘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十二諸侯年表）

「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平準書）

司馬遷將這種樸素的辯證思想用來研究歷史，因此他的著作自然就具有深刻的歷史觀點，濃厚的人民意識，宏大的寫作氣魄了。

當然，司馬遷是生長在封建社會的人，他的進步性終究是有限的，而且富於道家思想，多少還是舊制度的維護者。因此，司馬遷的著作並不能避免當時的歷史限制性，我們不能因此而責備他。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他能有上面這些觀點，並用來治史，這就是他的偉大所在了。

總之，史記一書，是孔子春秋以後第一部有別裁深識的偉大著作，他那高度的概括，深刻的分析，全面的處理問題，都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茲總括史記全書的要點如下：（一）哲學方面，綜合古代學術思想而加以批判的總結，所謂「究天人之際」；（二）史學方面，縱貫上下數千年，橫及各國各階層，舉凡人類全體的活動，無不備載，並揭示其發展的過程，所謂「通古今之變」；（三）文學方面，草創體例開闢境界，多采的文學風格，高度的現實手法，所謂「成一家之言」。近人梁啟超於讀史記一文中說：

「史記以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組織而成。其本紀及世家之一部分為編年體，用以定時間的關係，其列傳則人的記載，貫徹其「人物為歷史主體」之精神，其書則自然界現象與社會制度之記述，與人的史相調劑。內中意匠特出，尤在十表。據桓譚新論，謂其「旁行斜上，并效周譜」，或以前嘗有此體制，亦未可知。然各表之分合，總出諸史公慘淡經營。表法既立，可以文省事多，而事之脈絡亦具。史記以此四部分組成全書，互相調和、互保聯絡，遂成一部謹嚴博大之著作。後世作斷代史者，雖或於表志門目間有增減，而大體組織，不能越其範圍。可見史公創作力之雄偉，能籠罩千古也。」

這是較確切的評價。至於讀法，梁啟超在讀史記法之一中，曾經提出一些意見：

「史記為正史之祖，為有組織有宗旨之第一部古史書，文章又極優美，二千年來學者家絃戶誦，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其地位與六經諸子相並，故凡屬學人，必須一讀，無可疑者，惟全篇卷帙頗繁，卒業不易，今為節省日力計，先剔出以下各部分：

（一）十表但問序文，表中內容不必詳究，但流覽其體例，略比較各表編次方法之異同使得。

（二）八書本為極重要之部分，惟今所傳似非原本，與其讀此，不如讀漢書各志，故可全部從省。

(三) 世家中吳、齊、魯、燕、管蔡、陳杞、衛、宋、晉、楚、越、鄭各篇，原料什九采自左傳。既讀左傳，則此可省。但戰國一部分之世家仍須讀。因戰國策太無系統故。

(四) 武帝紀、日者傳、龜策傳等，已證明爲偽書，且無雜淺俚，自可不讀，扁鵲倉公傳等，似是長編非定本，一涉獵便足。

以上所甄別，約當全書三分之一，所省精力已不少，其餘各部分之讀法略舉如下：

第一，以研究著述體例及宗旨爲目的而讀之，史記以極複雜之體裁混合組織，而配置極完善，前既言之矣，專就列傳一部分論，其對於社會文化確能面面顧及，政治方面代表之人物無論矣，學問藝術方面，亦盛水不漏，試以劉向七略比附之。如仲尼弟子、老莊申韓、孟子荀卿等傳，於先秦學派網羅略具；儒林傳於秦漢間學派淵源敘述特詳，則六藝略諸子略之屬也。如司馬穰苴、孫子吳起等傳，則兵書略之屬也，如屈原賈生、司馬相如等傳，則詩賦略之屬也，如扁鵲倉公傳，則方技略之屬也，如龜策日者兩傳，則術略之屬也，又如貨殖傳之注重社會經濟，外或佞幸兩傳暗示近代政治禍亂所伏，處處皆具特識，又其篇目排列，亦似有微意，如本紀首唐虞，世家首吳泰伯，列傳首伯夷，皆含有表章讓德之意味，此等事前人多已論列，不盡穿鑿附會也。若以此項目的讀史記，宜提高眼光，鳥瞰全書，不可徒拘拘於尋行數墨，庶幾所謂「一家之言」者，可以看出。

第二，以研究古代史蹟爲目的而讀之，史記既爲最古之通史，欲知古代史蹟，總應以之爲研究基礎，爲此項目的而讀，宜先用「觀大略」的讀法，將全篇一氣呵成，瀏覽一過，再用自己眼光尋出每個時代之關鍵要點所在，便專向幾個要點有關係之事項，注意精讀，如此方能鉤元提要，不至泛濫無歸。

第三，以研究文章技術爲目的而讀之：史記文章之價值，無論何人當不能否認，且二千年來相承誦習，其語詞字法，早已形成文章常識之一部，故專爲學文計，亦不能不以此書爲基礎，學者如以此項目的讀史記，則宜擇其尤爲傑作之十數篇精讀之，孰爲傑作，此憑各人賞會，本雖有確定標準，吾生平所最愛讀者則以下各篇：

項羽本紀

信陵君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魯仲連鄒陽列傳

淮陰侯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貨殖列傳

太史公自序

按：梁氏所選十篇，誠爲佳構，本書大體上均已收入。

漢書，一般稱爲班固所作，實際上，它是班彪、班固和班昭三人（外加馬續）聯合著成的。

班氏世代豪族，班固的父親班彪和伯父班嗣，都是西漢末年有名的學者，大文學家揚雄等「莫不造其門」。班嗣在思想體系上是黃老派，而班彪則是正統派——孔孟派。班彪正統思想明顯地表現在他著的王命論上。

班彪以前，已有許多人在寫「續史記」一類的書，如馮商、衛衡、揚雄、史岑、劉歆、蕭奮、金丹、韋融等，班彪精通歷史，他認爲這些人的著作「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而且揚雄、劉歆的著作又在稱揚王莽，因此就起了寫續史記的念頭。他從漢武帝起，「探前史遺事，傍貫異聞」（范曄：後漢書班彪傳），作史記後傳六十五篇，未成而卒。

班固是班彪的兒子，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三十二年），卒於和帝永元四年（公元九十二年）。他年輕時在太學誦讀，父親死後，在家私自續寫父書，被人告發，說他「私改作國史」，被捕下獄。他的弟弟班超求見漢明帝，說明班固著作的本意，明帝就將班固釋放，命他担任蘭台令史，專心編寫漢書。

班固除精通歷史外，還有很高的哲學修養和文學修養，著有兩都賦、幽通賦、終南山賦、答賓戲等數十篇文學著作。章帝初年，他被調到白虎觀主持經學討論，做出總結，就是流傳到現在的白虎通義一書。這本書是屬於唯心論的著作，重要是討論五經的異同，為統治階級奠定思想基礎。東漢初年，農民革命被鎮壓下去不久，漢政權的封建統治正在鞏固階段，這時的哲學體系，其所以唯心論為最盛，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的。

班固是正統派的學者。「學而優則仕」，是正統派學者的一貫思想，班固也不能例外。他熱中於做官，因此就投靠權貴竇憲。和帝永和元年（公元八十九年），班固隨車騎將軍竇憲北伐匈奴，大破匈奴於稽落山，匈奴單于一直逃到東歐去了。竇憲遂登燕然山，令班固勒石作燕然山銘。竇憲既破匈奴，回到東京，就企圖謀反，被發覺，竇憲自殺，班固被捕，死於獄中。時年六十一歲。班固死後，漢書還沒有寫完，由他的妹妹班昭續成漢書。

漢書繼承了司馬遷史記的傳統，是我國第一部斷代史著作。同時，它也是第一部純粹從歷史學觀點着眼編寫的歷史，因此它與史記不同。史記一方面是歷史著作，一方面又是一部優美的文學書籍，

因而文體不一，選擇也不盡依史學標準，照班彪的批評，就是「其書刊落不盡，尙有盈辭，多不齊一。」漢書在寫作之初就以當作歷史著作爲明確目標，所以它注意「慎覈其事，整齊其文」（班彪傳）。漢書以後，范曄修後漢書，陳壽修三國志，直到清初監修明史爲止，形成了一部縱貫數千年的正統的歷史巨著——二十四史，這樣浩博的史學著作，是中古時期歐洲任何國家所沒有的。在二十四史的形成中，班固的漢書實起了繼往開來的作用。

漢書的特點之一，是它對政治經濟制度有着較詳盡的敘述，這也是從司馬遷史記繼承下來的良好傳統。漢書的食貨志二卷記載漢代的經濟制度及生產力發展情況，禮樂志、刑法志等記載了當時的政治法律制度。這使二千年後的我們在研究漢代的社會制度時得到了不少方便。

我們上面說過，班固是正統派的學者，但他與後代的正統派學者還是有一些區別的，因爲人民在他的心目中仍舊有較高的地位，在他的著作中，愛護人民的思想也不斷流露出來，例如在循吏列傳中，他歌頌出自民間的漢宣帝，被他選爲循吏的文翁、召信臣等人都是「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的人，都是爲人民謀物質福利或文化福利的人，而不是那些坐在太守府辦公廳中自高自大大空講道理的人。班固贊揚這些人的功績，說他們「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在霍光傳中，班固肯定廢棄暴君的霍光是正面的人物，並且對出自民間的宣帝頗事贊揚，而寫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却能把霍氏反人民的驕橫面貌爲之曲屈傳神。

班彪、班固既然都是正統派的學者，因此在他們的著作中，基本上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的，這

就使漢書在風格上精神上與史記有了很大的不同，並且在寫作水平上也遠落在史記之後。

漢書的作者批評史記道：「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豪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漢書卷六十二司馬遷傳）

這些話正標明了漢書的立場，漢書以「聖人」的「是非」爲是非，論「大道」則本於「六經」，崇尚孔子而反對百家，正常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話。班固從統治階級利益出發，就主張人民各安本分，反對僭越做上的游俠。司馬遷說郭解是「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而班固則換寫爲「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班彪甚至認爲司馬遷同情勞動人民，不守孔孟之道，因此被漢武帝處以腐刑，是罪有應得的。凡此種種，都說明了班固父子的思想傾向的保守性。

在階級觀念支配下，漢書的體例也受封建觀念和正統思想的嚴格支配。班氏父子不滿於司馬遷的寫法，認爲司馬遷把與劉邦爭天下的項羽寫成本紀，而且放在漢高祖劉邦本紀之前，簡直是看不起漢朝的表現。司馬遷並將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陳涉寫作世家而不寫列傳，反之，將漢初諸侯淮南王衡山王則寫作列傳而不寫世家，「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史記後傳略論）他認爲這是違反封建等級觀念和正統思想的。因此班彪父子就從正統觀念和等級觀念出發來糾正司馬遷所造成的影響。在漢書中，項羽和陳涉都被排到列傳裏，而且兩人放在一篇，稱陳勝項羽列傳了。

從統治階級和正統觀念出發，班固的哲學是唯心論的，他反對司馬遷從物質條件分析事物的觀點，而主張用道德修養來約束人民。司馬遷信仰管仲的思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仁義附焉。」而班固則主張孔子的說教：「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義）而賤利。」在班固看來，只要有一大羣道德家出來說教，天下就可以太平，用不着提高物質生產力、改良人民生活的。人民信仰了道德說教後，自然而然會「貴誼而賤利」。可是二千年來的歷史却證明了這話是不正確的。在階級社會裏，統治階級首先是導民以不德的人。道德說教的目的只是迷惑人民，使人民安分地受統治，受剝削而已。班固的道德說教觀念，在他的漢書中是表現得很深刻的。

由於漢書有上述這些缺點，所以他在敘述上就較缺乏同情人民的飽滿的感情，在描繪人物時就不像史記那樣栩栩如生，總之在各方面都遠遠落在史記之後。我們在本書中把漢書選得較少，正是由於這個原因。

漢書雖有上述缺點，但我們並不能就此全盤否定漢書的價值。在封建社會裏編寫的著作，大多不能越出這一社會統治階級的立場，這是不足為奇的事。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從歷史學的觀點來看，漢書是有很高的地位的，當我們用唯物論的觀點來研究我國古代史實時，漢書實為不可缺少的一部參考書。

說到漢書讀法，近人黃侃在漢書綱領中，曾提出四點，錄供參考：